

許明 編著

中國佛教金石文獻

上海書店出版社

塔銘墓誌部一 東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卷上

道安

許明 編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中國佛教金石文獻

塔銘墓誌部一 東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卷上

遼寧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佛教金石文獻·塔銘墓誌部：全十冊 / 許明
編著. —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458-1640-2

I. ①中… II. ①許… III. ①佛教-金石-文獻-匯
編-中國 IV. ①B94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099854號

責任編輯 梁健民 鄒燁
裝幀設計 不二金石文化
美術編輯 鄺書徑
技術編輯 吳放

中國佛教金石文獻
塔銘墓誌部
(全十冊)

編著 許明

出版 上海書店出版社
(上海福建中路一九三號)

發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發行中心

印刷 常州市金壇古籍印刷廠
有限公司

定價 捌拾玖圓

上架建議：佛教·文獻

ISBN 978-7-5458-1640-2



定價：8000.00圓

易文網：www.ewen.co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94.5 字數 5000,000

2018年6月第一版 2018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458-1640-2/B·88

金石傳千秋

佛光山開山大師

星云

佛教文獻的分類與整理工作，可以遠溯自佛陀入滅後的多次經典結集。

佛教傳來中國後，隨著譯經著述的逐漸開展與繁榮，更積累了大量的文獻。爲了避免這些文獻的散失，以及能更方便地閱讀利用，於是，經論編修成藏，零篇彙聚爲集，如《弘明集》《廣弘明集》《法苑珠林》等等，都是古代佛教文獻的扛鼎之作，影響深遠。

關於佛教金石文獻方面，佛教學者也是很早就重視並專門收集整理。像梁僧祐的《諸寺碑文》四十六卷，梁元帝蕭繹的《釋氏碑文》三十卷，只可惜這兩種書籍在很久以前就佚失。

宋元以來，金石學悄然興起，包括佛教金石文獻在內的各類文獻，被廣泛錄於各種著作之中，爲後人的整理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許明居士在二零零二年出版《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之後，現在又秉持極大的耐心和堅韌的意志，克服了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編纂完成了這部《中國佛教金石文獻》著作，可謂意義重大。

這部集大成之作，地理上包括了中國大陸以及港澳臺地區；時限主體爲佛教初傳到民國三十八年；內容涉及佛教與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民族、信仰、醫藥、藝術等各個方面。總字數達一千五百萬字，收文二萬二千篇，引用書目一千餘種，結集成二十大冊。

全書廣泛收羅原刻石、拓本、金石文獻、大藏經、佛寺志、地方志、各朝全書、叢書，以及各種專著、抄本、期刊等有關佛教金石文獻資料，然後根據內容，編纂爲寺宇殿閣、塔銘墓誌、造像題記、寺產牒文等四篇。

此書部帙龐大，使用方便，它的成功出版，定可成爲學林之一助。

許明居士堅持十多年做一件事情，令人欽佩！畢竟在這快速時代，類似傳統文人「十年磨一劍」的澄心專注、精進執著已經不多見了。他希望我能爲此書寫篇序文，聞訊歡喜。

我十二歲時出家於南京棲霞寺，此爲南齊古剎，本是明徵君舍宅創建的，江總一碑，石刻尚存。到臺灣弘法之後，於一九六七年購得大樹鄉坡地建設佛光山道場，爲了紀錄創寺因緣及檀施功德，也刻下不少石碑，所以我對金石碑刻是有些感情和喜愛的。加之同許明居士先前也有若干緣分，故雖身有老疾，義不獲辭，隨喜讚歎，樂爲之序。

中華文化的希望——《中國佛教金石文獻》代序

方廣錫

金石資料在歷史研究、佛教研究中的重要價值，研究者都很清楚。所以自古「金石」成「學」，至清代「金石學」蔚為大宗。有關情況，已有許多相關著作面世，許明同志在他的《中國佛教金石文獻·前言》中也有簡單介紹，不需要我在這篇短序中再加饒舌。

當年發起編纂《藏外佛教文獻》，在第一輯「卷首語」中解釋什麼叫「藏外佛教文獻」時，我就把「與佛教有關的金石資料」納入整理目標，並在《藏外佛教文獻》第四輯發表過四川大足的若干石刻資料。其後在籌備《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下編）時，我向任繼愈先生建議，將金石資料納入，先生同意這一建議。由於金石資料外延廣泛，收集困難，而《中華藏》的編纂有時限要求，所以當時的設計是設置一個二級類目「碑銘類」，放置在「史傳地志部」下。亦即第一步先收集、整理石刻中的「碑銘」資料，以後如有條件，再擴展到其他金石資料。兩千年來，中國佛教留下豐富的文獻資料，《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上、下兩編雖然合計收入約三點六億字，依然有不少應收而未收的。所以，碑銘以外的其他金石資料，可以考慮放在將來編纂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補編）中。任先生也同意了這一思路。當然，由於各種原因，二〇一二年八月以後我不再參加《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下編）的工作，現在的具體情況不是很清楚。

許明同志於二〇〇二年完成了他五卷本《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以後，十餘年來，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又以個人之力，分別「寺宇殿閣」、「塔銘墓誌」、「造像題記」、「寺產牒文」等四篇，完成了一千五百萬字的《中國佛教金石文獻》，結集為二十冊。

二〇〇二年，當我知道許明同志在沒有工作，沒有穩定的收入的情況下，做成《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

集》這一非常有學術價值，卻未必有什麼經濟效益的事情以後，非常感慨。曾在爲他寫的序中說：「在社會普遍浮躁，學術正在腐敗的今天，這實在是一股清新的空氣。面對許明及他的工作，許多人應當羞愧。人之所以爲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十餘年來，許明同志依然始終處在沒有工作，沒有穩定的收入的情況下，但竟然又完成如此煌煌巨著，其發心、其毅力、其鍥而不捨的精神、其最終取得的成果，真讓人無法僅僅用「歡喜贊歎」四個字來表述。

坦率說，本書的分量，不亞於任何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個體制外的學者，僅憑一己之力做成功了。這些年，眼看社會種種亂象，眼看學術日益腐敗，我的心是很悲涼的。我在內心一次又一次地告誡自己：「要相信中國文化的自淨能力！」但心中隱隱約約也有另一種聲音：「真的嗎？真能自淨嗎？」看到許明同志的工作，想到千千萬萬像許明這樣散落民間，爲繼承與光大中華傳統文化正在埋頭苦幹的人，我想，中華文化所以能屢踏屢起，廣續千年，所以有希望、有前途、有未來，其底蘊就在這裏吧！

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於古運河北端

前言

許明

金石文字具有證經補史的作用。史籍的介質多為紙帛等極易損毀的材料，隨着歲月遞遷，加上後人手手傳抄，難免會有烏焉不詳或魯魚亥豕之誤；而金石文字的材質為金銅鐵石之類，一旦創立，可存久遠，真實可信。諸如名山勝地創寺樹碑可補《地理志》《名山志》；塔銘墓誌可補歷代《高僧傳》《居士傳》；佛教造像題記可補《釋老志》等等。

最早注意到金石資料鉅大價值的是史學家和地理學家。西漢司馬遷《史記》、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楊銜之《洛陽伽藍記》等都著錄有大量碑刻。其中，《洛陽伽藍記》所著錄的二十餘種寺院碑刻，在屢經戰亂之後，陵谷遷移，早已湮滅無蹟，徒留文字供後人浩歎。

金石之學濫觴於漢代，光大於宋代，全盛於清代。經過兩千多年來文人學者的剔抉搜羅，考訂辨識，編纂成帙，形成龐大的金石文獻體系，據容媛《金石書錄目》記載，僅清乾隆之後的金石著作就高達九百多種。

近代以來，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傳統金石學結合了西方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在碑刻資料的蒐集整理、綜合研究等方面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研究課題更趨於細化，例如出現了戲劇、水利、地震、經濟、宗教等專題性極強的金石集錄，研究方法則更趨嚮於本體化，亦即更加注重碑刻文獻本身的史料價值及研究意義，成功突破了傳統上證經補史的學術框框，可謂是生機勃勃，一派繁榮。

《中國佛教金石文獻》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產生的。本書分為四個部分。一、寺宇殿閣：主要收錄殿閣佛塔、道路橋梁，以及在寺院舉行佛教活動的碑記。二、塔銘墓誌：主要收錄佛教四眾弟子的銘誌，

部分屬於塔銘性質的經幢記也歸此類。三、造像題記：主要收錄石刻造像、金銅造像、小石塔、經幢、經碑、香爐、鑄鐘、建築構件題記，以及紀遊題壁等。四、寺產牒文：主要收錄涉及佛教財產及經濟活動的政令公文、告示聲明等碑記。並且編有作者、篇名、書篆者、刻工、引用書目等多種索引，以便大家使用。

在本書編纂過程中，得到過各方的理解和支持。承蒙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題簽、佛光山開山宗師星雲長老、文獻大家方廣錫先生賜序。並獲佛教文化學者李家振先生一貫幫助、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東方哲學研究室范文麗博士英譯，在此謹表謝忱。餘詳見後記，不復一一。

今塔銘墓誌部分率先脫稿即將出版，謹請方家飽學建議指謬，以期奉獻出一部純粹精湛足於傳世的作品。

丁酉歲佛誕日於京北

十年琢磨，重器之質——簡介《中國佛教金石文獻》

許明

日前，在上海市福州路世紀出版集團總部拜訪了上海書店出版社社長許仲毅先生，許社長慧眼識珠，果斷決定出版《中國佛教金石文獻》一書，令人欽佩。此間，許社長建議由我自己寫一篇該書的評介，理由是作者最熟悉自己的書。話似乎在理，所以也就不避「王婆賣瓜」之嫌了。

《衛風》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歷來被國人奉為修身治學的一個最高準則。一塊好材料，起初也許不顯眼，但是經過一番獨具匠心，精益求精地琢磨之後，就有可能來個華麗轉身，被打造成一件價值連城的國之重器。

據實而言，《中國佛教金石文獻》以其獨特的題材、閱富的收羅、翔實的內容和精心的整理，完全具備「重器」之質。

本書的題材涉及多個學科，但主要還是在於金石學和佛教文獻學這兩大學科的文匯點上。金石是其載體，佛教文獻是其內容。

先說佛教文獻學。佛教文獻學是通過構建完善自身理論與學科建設，而以更科學、更高效地對佛教文獻進行搜集、整理、收藏和使用的新興學科。從廣義上講，凡人類存世的所有語言種類和載體的佛教文獻，都是它的研究對象。狹義上是專指漢文佛教文獻，地理上則主要涵蓋中日韓等東亞地區。漢文佛教文獻可分為兩大塊：一、以大藏經為中心的精華佛教文獻。這些佛教文獻經過二千年來歷代高僧大德等教界精英的翻譯、注疏、編目、校讎、辨偽、編纂等，內容形式趨於穩定固化，被比較完整明確地保存下來，學界稱

之爲「老資料」。二、歷史上被排除於大藏經之外的民間佛教文獻，這部分文獻比較零散龐雜，五花八門，原先認爲它沒有什麼價值，或者說利用價值不高；然而近代以來，學風丕變，被人們重新認識，確認有重大文獻價值。比如造像記，又比如疑偽經，曾長期無人問津。直到近現代，學界從文化融合、思想演變的角度予以重新詮釋，發現是我們瞭解早期佛教信仰傳播、寺院經濟活動以及佛教中國化過程中難得的史料，堪稱佛教文獻的活化石。便又重新重視加以收集、整理、利用。諸如此類則是「新資料」。「老資料」亟需與「新資料」相互補充，激盪激活，找出新問題，得出新答案，形成新理論、新思想。

當前，對民間佛教文獻——「新資料」的挖掘整理，呈現兩大熱點，一是敦煌文獻，二是佛教金石文獻。其中尤以佛教金石文獻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利用爲方興未艾。

清錢大昕《關中金石記序》說：「蓋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壞；手鈔版刻，展轉失真。獨金石銘勒，出於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徵，故可寶也。」誠然，真實可信是金石文獻最重要的特性。因此，它的巨大價值意義，早被先哲所知，西漢司馬遷便在《史記》中著錄了秦《泰山刻石》等六文，開了先河。

而佛教金石文獻被正式著錄於古代典籍，則是在南北朝時期。北魏地理名著酈道元《水經注》和楊銜之《洛陽伽藍記》二書都有載錄。又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南朝梁代則出現了佛教金石文獻的專著，有梁僧祐《諸寺碑文》四十六卷，梁元帝蕭繹《釋氏碑文》三十卷，可惜二書都已佚失，幸存蕭繹一序以窺豹斑。

此後，佛教金石文獻作爲可靠的資料，被廣泛使用於歷史、地理、民族、社會和藝術等各領域的研究。比如歷代高僧傳的撰寫者，便把收集有關的金石文獻，作爲撰寫高僧傳的前期重要準備工作，在此略舉數則，以見一斑。梁寶唱《比丘尼傳》序：「乃博採碑頌，廣收記集，或訊之傳聞，或訪之故老，詮序始終，爲之立傳。」唐道宣《續高僧傳》序：「南北國史，附見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舉其器略。」明范景文《補續高僧傳》序：「河公枯筇所指，游遍名山古剎，搜剔碑版，攀藤籬，摹剝蝕，次第彙集。」

早期的中國禪宗史，一直是禪宗學者重點研究的課題。有關南能北秀間六祖之爭亦即正統之爭的歷史事實爲人樂道，視爲定論。然而，重新發現的《唐中岳沙門釋法如禪師行狀》碑，打破人們的固見，提出了「(菩提達摩)入魏傳可，可傳粲，粲傳信，信傳忍，忍傳如」的宗派傳承，爲我們提供「六祖」的第三種說法。又，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大唐東都荷澤寺歿故第七祖國師大德龍門寶應寺龍崗腹建身塔銘并序》出土於洛陽龍門唐寶應寺遺址，隨即引起中外佛學界的轟動，在中日等國掀起廣泛而深入的討論，諸如禪宗不同派系的六祖、七祖之爭，塔主生卒年月、卒葬地等問題都得到澄清或更深入地探討。

佛教造像歷來受到文人學者的鍾愛，但主要還是集中在案頭雅玩的藝術鑒賞方面，對於它的文獻資料價值，則是相當輕視的。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魏九級塔像銘》就說：「碑文淺陋，蓋鄙俚之人所爲。惟其字畫多異，往往奇怪，故錄之以備廣覽。」確實，此類造像若只是單獨零散地考察研究，是很難發現問題，進而提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但藉助統計學的研究方法，再同民族學、歷史地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相結合，一旦將這些數量衆多看似雜亂無章的造像題記歸納排列，便可使這些資料在歷史研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寫出一些好文章大文章。更重要的是此研究方法突破了傳統金石學證經補史的研究框框，發現了造像題記本身獨立的學術價值，從而開闢出一片研究的新天地。如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衆佛教信仰——以造像記爲中心的考察》一書，便是該領域的研究佳作。

在學術研究中，全面佔有資料是最關鍵的環節。從以上古今學者引用金石文獻治學的事例可以看出，他們在收集金石資料上，下了很大力氣，花去大量時間。如果能在佛教金石文獻方面編纂一部全面系統的符合現代學術規範的總集以方便使用，善莫大焉！時代呼喚佛教金石文獻集大成之作早日問世。

《中國佛教金石文獻》恰好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產生的。
下面請允許我羅列此書的一些基本數據：

十三年(已用寫作時間)；

一千五百萬字；

二萬二千篇(品)文獻；

一千餘種引用書目；

一千七百年(歷史跨度)；

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地理廣度)。

行文至此，我想起任繼愈先生說過的一段話：「一種偉大體系的完成，要具備三個必備的條件：第一要有一個較長時期的穩定政治環境；第二要有廣泛、完備的資料；第三要有卓越的思想家。今天我們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當務之急是資料積累。說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積累資料的時代並不過分，這是我們這一代文化人的歷史責任。……資料工作做得越充分，迎接未來的新體系越有盼頭。」(《般若心經譯注集成》序)

誠哉，斯言！

從這個意義層面上講，《中國佛教金石文獻》的出版問世，不僅是給學術界添磚加瓦、拋磚引玉，也是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而貢獻一分綿薄之力。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日於京北密雲之看山看水居

A History Engraved in Bronzes and Stones

Hsing Yun, the founder of the Fo Guang Shan

The categorizing and collating of Buddhist text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several Buddhist council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Buddha.

After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into China, a great number of Buddhist texts emerged along with the flourishing of transl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Buddhist works. To preserve these texts and make them more accessible to common readers, the sutras and treatises are organized as canons, whilst the scattered works are assembled as compilations. The examples, including *Hongming ji* 弘明集 (Anthology of Extended Brilliance), *Guang Hongming ji* 廣弘明集 (Expanded Anthology of Extended Brilliance), and *Fayuan Zhulin* 法苑珠林 (A Grove of Pearls in the Dharma Garden), all of which are classical and influential works in Chinese Buddhism.

Buddhist bronze and stone inscription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Buddhist scholars in a very early period. Many texts are collected and compiled, including the 46 volume *Zhusi Beiwen* 諸寺碑文 (*Epigraphs of the Temples*) that is compiled by Sengyou (僧祐, 445 – 518) of Liang Dynasty (502 – 557), and the 30 volume *Shishi beiwen* 釋氏碑文 (*Buddhist Epigraphs*) that is compiled by Xiao Yi (蕭繹, 508 – 555), the Emperor Yuan of Liang. Unfortunately both works have been lost since a long time ago.

The studies on bronze and stone inscriptions emerged quietly since the Song (960 – 1279) and Yuan (1271 – 1368) dynasties. Many bronze and stone inscriptive texts, including Buddhist inscriptions, are collected and presented in varied books. They are precious resources for the further collations and

studies of later generations.

Xu Ming, who is a lay Buddhist, published *Zhongguo fojiao jinglun xu ba ji ji* 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 (*The Collections of Forewords, Postscripts, and Records of Sutras and Treatises*) in 2002. Now he has conquered many difficulties that is beyond the imagination of common people and finished the compilation of this *Buddhist Bronze and Stone Inscriptions in China*, showing his great patience and strong will. This projec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his work epitomizes the inscriptions from the period of the Buddha's time through 1949 that are found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The inscriptions involve Buddhism and history, geography, politics, economic and military matters, society, nationality, faith, medicine, art, etc. The whole work includes 20 volumes, more than 1000 cited books, 22,000 pieces of articles, and 15,000,000 characters.

The texts of this book comes from carved stones, rubbings, bronze and stone documents, canons, chronicles of Buddhist temples, chorographies, encyclopedias of dynasties, series of books, researches, transcripts, and journals, and some other resources that are related to Buddhist bronze and stone inscriptions.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the work is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temples and pavilions, pagoda inscriptions and tombstone epigraphs, epigraphs of Buddhist statues, official documents about the monastic properties. This multiple-volumed work is easy to use.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work will no doubt greatly contribut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Xu Ming has been persisting on this work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How admirable! In our time, things upgrade quickly. The concentration and diligence of "grinding sword for decades" are not as common as that in the old times. I was very happy when I heard that he wanted me to write a foreword for this work.

I became a monk at Qixia Monastery (棲霞寺) of Nanjing when I was

twelve. This monaste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Southern Qi dynasty (479 – 502). Lord Mingzheng (明徵君) devoted his own house to the building of temples.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Jianzong Stele (江總碑) still exists. Afterward, I went to Taiwan to propagate the Buddha's teaching and bought a patch of hillside land to build Fo Guang Shan monastery. In order to record the history of this monastery and the devotions of benefactors, we also carved many steles. Thus, I have some emotional connections and affections to bronze and stone inscriptions. In addition, there are a few encounters between Xu Ming and me previously. Thus, though old and sick, I still accept his invitation, rejoice with praise and write this foreword with great happiness.

The Hope of Chinese Culture

A Foreword to Buddhist Bronze and Stone Inscriptions in China

By Fang Guangchang

All scholars are aware of the great value of bronze and stone inscriptions regarding the research on history and Buddhism. That's why the studies on bronze and stone inscriptions emerged in an early period and flour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Many related works in this area have been published. I will save my words on this since Xu Ming has already made an introduction in his *Preface* to this book.

Many years ago, I started the project of compiling *Zangwai fojiao wenxian* 藏外佛教文獻 (The Materials Beyond Chinese Buddhist Canon). In the Foreword of the first volume, I included "the bronze and stone inscriptions that are related to Buddhism" in the catalogue when I explained what is "the materials beyond Chinese Buddhist canon". In addition, I presented a few stone inscriptions that are from Dazu of Sichuan in the fourth volume. Afterwards, when we were preparing for the compilation of *Zhonghua Dazangjing: Hanwen bufen* 中華大藏經 - 漢文部分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Tripitaka Sinica), I made a suggestion to the well-respected scholar Ren Jiyu that we should enclose the bronze and stone inscriptions. He accepted the advice. We set up a category of "Stele Inscriptions" and placed it in the catalogue of "Historical Biography and Chorography". We started by collecting the stele inscriptions and hoped to include more bronze and stone documents in the future when right conditions are ready. In the past two thousand years, 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Buddhist documents have been created. Though the two volumes *Zhonghua*